

· 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学术主持人:胡 荣) ·

主持人语:社会资本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内近二十年来一个影响十分广泛的学术概念。该概念的盛行得益于几位著名学者的开创性研究。第一位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大家共同熟悉和认可的、或多或少已形成制度化的关系网络联系在一起。这些资源就像集体共有的资本一样,能够给网络里的每个成员提供必要的帮助”。第二位是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他提出社会资本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它首先是由社会结构的一些要素组成;其次,这些要素能够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美国学者帕特南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中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等特点,它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的行动而提高社会的效率”,在其经典著作《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他用社会资本的概念来解释意大利北部许多地方政府的表现都比南部城市好的原因。美籍华人社会学家林南则把社会资本理解为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他认为“嵌入”于个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是一种社会资源,个人通过关系从他人那里获取资源。尽管不同学者对社会资本的定义不同,但社会网络被普遍认为是形成社会资本的根基,同时也是构成社会资本的基本元素。

本专栏收录的两篇文章,从不同侧面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研究。胡荣的《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的婚姻质量》在学术界率先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研究婚姻质量,数据表明信任对于婚姻满意度有很大影响。阳杨的文章运用 JSNET2009 调查数据,通过对创业者及其父辈的数据分析,发现关系网络直接影响创业者的成功,而代际资本通过影响创业者关系网络间接影响到创业者的成功,代际资本以隐秘的方式传递。

## 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与婚姻质量

胡 荣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0)

**【摘要】** 自社会资本这个概念被介绍到国内以来,许多学者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广泛研究。但是迄今为止,中外文献中还没有人系统地研究社会资本对婚姻质量的影响。本文在学术界率先运用社会资本的概念研究婚姻质量,根据问卷调查数据,探讨了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与婚姻质量之间的关系。多元回归分析表明,社会资本的各因素,特别是特殊信任因子和同事信任因子,对于城市居民的婚姻满意度因子有显著影响。不过,社会资本各因素对于婚姻质量的其他方面,包括夫妻关系因子、分手倾向因子和性生活质量因子的影响却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关键词】** 社会资本; 婚姻质量; 婚姻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C91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 [2013]06-0042-07

###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的提出

婚姻质量是对婚姻关系进行的一种评价,婚姻质量越高,婚姻的稳定性越好<sup>①</sup>,婚姻质量是体现婚姻是否幸福、家庭是否稳固、社会是否稳定的重要指标。在对婚姻质量概念的界定方面,主要分为几派,其中婚姻

收稿日期:2013-03-18

作者简介:胡 荣(1962—),博士,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sup>①</sup>徐安琪、叶文振《婚姻质量:度量指标及其影响因素》,《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调适学派坚持质量的客观性,关注婚姻关系本身,认为婚姻质量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通常以夫妻双方互动的模式、冲突的数量、交流状况、以及夫妻之间关系的结构特征等作为测量指标<sup>①</sup>。个人感觉学派则关注个体对婚姻的感性认知和体会,认为婚姻质量是一个主观的、单一维度的概念,等同于婚姻满意度。婚姻满意度是已婚夫妇对其婚姻关系满意程度的评估,是衡量婚姻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本文认为应把婚姻质量视为同时与婚姻满意和婚姻调适相联系的混合性概念,即高质量的婚姻不仅在客观上表现出夫妻之间融洽的关系,而且还在主观上对配偶及双方关系表示满意,即婚姻质量是夫妻的情感生活、物质生活、余暇生活、性生活、夫妻双方的凝聚力在某一时期的综合状况。它以当事人的主观评价为尺度,并以夫妻调适的方式和结果的客观事实来描述。高质量的婚姻表现为当事人对配偶及其相互关系的高满意度,具有充分的感情和性的交流,夫妻冲突少及无离异意向<sup>②</sup>。

那么,究竟有哪些因素影响婚姻质量呢?西方学者有关婚姻质量影响因素的解释框架大致分为综合模型和控制模型两类。婚姻质量影响因素的综合模型是1970年代后期由格林提出来的<sup>③</sup>,其学术目标是在一定的理论思考和推敲的基础上,把尽量多的影响因素吸收到模型中来,通过建立庞大的理论架构来确定婚姻质量的所有决定因素以及这些因素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对婚姻质量施加影响,提高整个模型对婚姻质量的解释能力,或是从更多的角度透视婚姻质量差别的主要原因,同时,通过对各自变量影响强度的相互比较,确定与婚姻质量关系最密切的变量。综合模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格林的婚姻幸福感多元分析模型和刘易斯的“三段论”婚姻质量解释模型<sup>④</sup>。婚姻质量的控制模型主要是通过对其他影响因素的统计控制来揭示和估计所感兴趣的某个决定因素对婚姻质量的影响性质和强度<sup>⑤</sup>。它所关心的不是估计整个模型对婚姻质量的拟合度,而是研究某个特定的决定因素是否具有理论所假设的影响方向和解释能力。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家庭生命周期、结婚年数、社会角色<sup>⑥</sup>。除上述影响因素外,其它影响因素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如宗教信仰的一致性和虔诚程度均与婚姻质量呈现明显的正相关;社会文化背景不同的夫妻不容易相互适应,会增加夫妇之间不协调甚至矛盾冲突的几率,即配偶之间的社会文化差异会导致婚姻生活低质化;精神状态即神经质的稳定更有利于提高婚姻质量;身体健康与婚姻质量之间密切相关<sup>⑦</sup>。夫妻共同参与休闲活动有助于增加婚姻的满意度,而独自休闲方式则和婚姻满意度呈负相关;初婚者的平均婚姻质量略高于离异后的,并且在再婚关系中,男性的婚姻满意度比女性高等等。

尽管已有的文献特别是婚姻质量的控制模型,探讨了不同因素对于婚姻质量的影响,但现有的研究并没有涉及社会资本对婚姻质量的影响。本项研究试图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探讨社会资本对于婚姻质量的影响。

社会科学领域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法国学者迪尔凯姆对群体生活的强调,但直接运用社会资本概念进行理论研究还是近几十年的事。简·雅各布斯(Jacobs)、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琼·克劳德·帕瑟仑(Jean-Claude Passeron)、罗瑞(G. Loury)、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亚历山德罗·波茨(Alejandro Portes)等学者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使这个概念不断完善并引起广泛关注。布迪厄认为,所谓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那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sup>⑧</sup>。也就是说,布迪厄所说的社会资本是一种可以从中吸取某种资源的、持续性的社会网络关系,被联系在其中的每个成员都可从中受益。科尔曼按照社会资本的功能,将其界定为“它不是一个单实体,而是由一系列拥有两个共同要素的不同实

①Glenn, N. D. 1990.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marital quality in the 1980s: a critical review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52: 818-831.

②徐安琪、叶文振《婚姻质量:度量指标及其影响因素》,《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③Levers, R. A. and Graham B. Spanier. 1979. *Theorizing about the quality and stability of marriage*. New York: Free Press.

④Levers, R. A. and Graham B. Spanier. 1979. *Theorizing about the quality and stability of marriage*. New York: Free Press.

⑤徐安琪、叶文振《婚姻质量:度量指标及其影响因素》,《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⑥Rollins, B. C. And Cannon, K. L. 1974. "Marital satisfaction over the family life cycle: a reevaluatio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36: 271-282

⑦Chan, R. C. 2000. "How does spinal cord injury affect marital relationship? A story from both sides of the couple". *Disability and Rehabilitation* 22(17): 764-775.

⑧Bourdieu, P. 1985.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 JG Richardson. New York: Greenwood, P248.

体所构成,这些要素均由社会结构的一些方面构成,而且它们促进了参加者(无论是个人或者法人参加者)的某些行动。”简言之,所谓社会资本,就是作为个人拥有的资本财产的社会结构资源。真正使社会资本的概念引起广泛关注的是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帕特南,他从政治角度研究社会资本,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sup>①</sup>。

社会资本的概念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在许多研究中将社会资本当作自变量,用来分析它对个体其他行为的影响。帕特南在美国的研究表明,在美国一些社区的公民的高度参与和低犯罪率、低死亡率以及较高的教育效果有着直接的联系<sup>②</sup>。一些学者发现社会资本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sup>③</sup>,而有的学者在日本神户和印度古吉拉邦的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存量高的社区灾后重建工作也更顺利<sup>④</sup>,国内学者的研究则表明社会资本有助于化解村庄内部的冲突<sup>⑤</sup>。还有一些研究从微观角度探讨社会资本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例如,有学者在坦桑尼亚的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是家庭收入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sup>⑥</sup>,有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可以增进身心健康<sup>⑦</sup>、促进政治参与<sup>⑧</sup>、增加幸福感<sup>⑨</sup>、增进城市居民对外来农民工的接纳<sup>⑩</sup>等等。那么,社会资本对于婚姻质量会产生什么的影响呢?这是本项研究要探讨的问题。

## 二、研究设计和变量测量

本研究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法,于2007年1月到2月,在厦门岛内思明区和湖里区抽取1200个居民,对这些居民进行入户调查访问,使用的问卷为“厦门居民婚姻家庭状况调查问卷”,共获取有效样本792份。本研究的目的是研究厦门市居民的婚姻质量,因此选取婚姻状况为“初婚有配偶”、“离异后再婚有配偶”以及“丧偶后再婚有配偶”三种情况的样本作为分析对象。在回收的有效问卷中,符合本研究设计的问卷有383份。问卷中关于婚姻质量的问题主要围绕着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婚姻家庭状况和婚姻质量等方面设计,绝大多数题目能够真实有效地反映出厦门市居民婚姻质量的状况。

在符合要求的383份问卷中,有女性179人,占总人数的有效百分比为47.1%,男性201人,占总人数的有效百分比为52.9%。从年龄看,25岁及以下的被访者有46人,占总样本的12.4%;26-35岁的被访者有177人,占总样本的47.8%;36-45岁的被访者有71人,占总样本的19.2%;46-55岁的被访者有47人,占总样本的12.7%;56岁及以上的被访者有29人,占总样本的7.8%。从受教育程度看,“文盲、半文盲”的有12人,占样本的3.1%;“小学”的有19人,占样本的5.0%;“初中”的有84人,占样本的22.0%;“高中、中专等中等技术学校”有133人,占样本的34.9%;“大学”的有120人,占样本的31.5%;“研究生及以上”的有13人,占样本的3.4%。

### (一) 因变量婚姻质量的测量

本研究对于婚姻质量的定义是:婚姻质量是夫妻的情感生活、物质生活、余暇生活、性生活、夫妻双方的凝聚力在某一时期的综合状况。它以当事人的主观评价为尺度,并以夫妻调适的方式和结果的客观事实来描述<sup>⑪</sup>。因为婚姻质量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无法用“从总体上说,您认为自己的婚姻质量可以打几分”这样简单的问题进行单一指标的测量。在问卷中,我们将婚姻质量的指标分成两大类,即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其中,主观指标包括婚姻满意度、对配偶的满意度、物质生活的满意度;客观指标包括性生活质量、婚姻互动和夫妻内聚力,共有23个问题(参看表1)。我们对这23个指标进行效度检验,KMO样本测度值为0.901,

①[美]帕特南《使民主运作起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②Putnam, Robert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③Rupasingha, A., Goetz, S. J. and Freshwater, D. 2002.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as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counties”.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81: 139 - 155.

④Nakagawa, Y. and Shaw, R. 2004. “Social Capital: A Missing Link to Disaster Recove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ss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 22(1): 5 - 34.

⑤胡荣、黄晨颖《社会资本与和谐村庄建设》,《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⑥Narayan, D. and Pritchett, L. 1999. “Cents and Sociability: Household Income and Social Capital in Rural Tanzani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7(4): 871 - 897.

⑦胡康《社会资本对城乡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⑧胡荣《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5期。

⑨胡荣、王晓《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的幸福感》2012年中国社会学会年会论文。

⑩胡荣、王晓《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对外来工的态度》,《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3期。

⑪徐安琪、叶文振《婚姻质量:度量指标及其影响因素》,《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球形 Bartlett 检验的  $\chi^2$  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  $<0.0001$  ,说明该统计数据之间相关性很高 ,适合做因子分析。

运用主成分法对这 23 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 ,经最大方差法旋转 ,共提取 4 个因子:

(1) 婚姻满意度因子。包括“对夫妻感情生活满意度”、“对夫妻性生活满意度”、“对夫妻物质生活满意度”、“对夫妻业余生活满意度”、“对配偶能力满意度”、“对配偶收入满意度”、“对配偶对自己信任方面的满意度”、“对配偶对自己尊重方面的满意度”、“对配偶对自己体贴方面的满意度”和“对夫妻目前的感情评价”等 10 个项目。

(2) 夫妻关系因子。“夫妻婚姻生活平等程度”、“夫妻婚姻生活独立性程度”、“夫妻婚姻生活和谐程度”、“夫妻婚姻生活幸福程度”和“对配偶的满意度”等 5 个项目。

(3) 分手倾向因子。“配偶是否经常指责或者否定自己”、“是否对自己的婚姻有过失望的感觉”、“是否有过和配偶分手的念头”和“一年来您俩有无发生争吵”等 4 个项目。

(4) 性生活质量。“性生活中是否经常与配偶交流性感受”、“性交前抚爱的时间”、“性生活中是否经常体验过性快感”和“夫妻之间平时是否经常有亲昵行为”等 4 个项目。

表 1 婚姻质量的因子分析

项目	婚姻满意度因子	夫妻关系因子	分手倾向因子	性生活质量因子	共 量
夫妻婚姻生活平等程度	.125	.792	.099	.065	.657
夫妻婚姻生活独立性程度	.082	.789	.197	-.030	.669
夫妻婚姻生活和谐程度	.116	.844	.325	.057	.835
夫妻婚姻生活幸福程度	.116	.784	.325	.129	.751
对配偶的满意度	.335	.564	.401	-.046	.593
对夫妻感情生活满意度	.891	.170	.114	.040	.838
对夫妻性生活满意度	.867	.131	.123	.066	.789
对夫妻物质生活满意度	.827	.077	.043	.100	.702
对夫妻业余生活满意度	.767	.118	.169	-.022	.631
对配偶能力满意度	.843	.009	.182	.035	.745
对配偶收入满意度	.853	.011	.199	.009	.767
对配偶对自己信任方面的满意度	.877	.114	.043	-.042	.785
对配偶对自己尊重方面的满意度	.874	.100	.090	-.121	.797
对配偶对自己体贴方面的满意度	.858	.103	.120	-.108	.773
对夫妻目前的感情评价	.702	.210	.234	-.065	.595
性生活中是否经常与配偶交流性感受	.118	-.088	.046	.754	.593
性交前抚爱的时间	-.036	-.022	.153	.746	.582
性生活中是否经常体验过性快感	-.101	.167	-.092	.753	.613
夫妻之间平时是否经常有亲昵行为	-.034	.099	-.186	.730	.606
配偶是否经常指责或者否定自己	.277	.204	.698	-.090	.614
是否对自己的婚姻有过失望的感觉	.211	.282	.694	-.020	.640
是否有过和配偶分手的念头	.030	.257	.757	-.006	.520
一年来您俩有无发生争吵	.249	.288	.611	.039	.579
特征值	7.39	3.355	2.615	2.313	15.673
解释方差	32.129%	14.588%	11.369%	10.056%	68.142%

(二) 社会资本的测量

如前所述 ,在帕特南的定义中 ,社会资本包括信任、网络和规范等内容。参照以往的一些研究<sup>①</sup> ,在本项研究中 ,我们主要从信任和网络(即社团参与)两个方面测量社会资本。

<sup>①</sup>胡荣 《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居民的地域性自主参与》,《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 2 期。

1. 信任

我们用 13 个指标测量受访者对于不同对象的信任程度。这 13 个项目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731, KMO 和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chi^2$  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 < 0.0001。运用主成分法进行因子分析,经最大方差法旋转,共提取 3 个信任因子,分别命名为“特殊信任因子”、“普遍信任因子”和“同事信任因子”。特殊信任因子是对于关系比较近的人的信任,通常信任程度较高,包括对亲密朋友、家庭成员、直系亲属以及其他亲属的信任。普遍信任因子是对关系较远的人的信任,包括对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一般熟人、生产商、网友、销售商的信任。同事信任因子介于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之间,包括对单位同事、单位领导、邻居以及一般朋友的信任。

表 2 信任的因子分析

项目	特殊信任因子	普遍信任因子	同事信任因子	共量
对单位同事的信任	.259	-.036	.827	.752
对单位领导的信任	.176	.045	.815	.697
对邻居的信任	.146	.009	.778	.626
对一般朋友的信任	.282	.071	.596	.440
对亲密朋友的信任	.772	-.258	.413	.834
对家庭成员的信任	.822	-.318	.332	.886
对直系亲属的信任	.867	-.190	.290	.872
对其他亲属的信任	.814	.074	.253	.732
对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	-.007	.745	.161	.581
对一般熟人的信任	.347	.386	-.023	.270
对生产商的信任	-.090	.861	.051	.752
对网友的信任	-.394	.734	-.117	.707
对销售商的信任	-.136	.827	-.051	.705
特征值	3.186	2.885	2.782	8.853
解释方差	24.509%	22.194%	21.4%	68.103%

2. 社团

我们共用 8 个项目来测量受访者的社团参与。这 8 个项目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776, KMO 和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chi^2$  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 < 0.0001, 适合做因子分析。我们用主成分法进行因子分析,经方差最大法旋转,提取 2 个因子,分别命名为“正式社团因子”和“非正式社团因子”。前者包括是否经常参加战友聚会、是否经常参加行业协会活动、是否经常参加居委会的会议或活动、是否经常参加寺庙或教会的活动,这些社团活动相对比较正式或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后者包括是否经常参加同乡聚会、是否经常参加校友或同学聚会以及是否经常参加单位组织的集体活动等,这些社团活动相对较为松散和自由。

表 3 社团参与的因子分析

项目	正式社团因子	非正式社团因子	共量
是否经常参加战友聚会	.511	.128	.277
是否经常参加行业协会活动	.623	.421	.565
是否经常参加社区居委会的会议或活动	.816	.074	.672
是否经常参加寺庙或教会的活动	.786	.053	.621
是否经常参加学术社团的活动	.556	.444	.506
是否经常参加同乡聚会	.129	.703	.511
是否经常参加校友或同学聚会	.055	.827	.686
是否经常参加单位组织的集体活动	.239	.715	.569
特征值	2.319	2.088	
解释方差	28.988%	26.094%	55.082%

三、研究发现

以婚姻质量的4个因子,即婚姻满意度因子、夫妻关系因子、分手倾向因子和性生活质量因子为因变量,以测量社会资本的特殊信任因子、普遍信任因子、同事信任因子、正式社团参与因子、非正式社团因子作为主要预测变量,同时加入性别、年龄、户口、家庭月收入(只限模型III)、教育程度等控制变量,分别建立4个多元回归模型。在控制变量中,性别、户口和教育程度是虚拟变量。

表4 影响婚姻质量因素的回归分析(括号内为标准回归系数)

	模型 I: 婚姻满意度因子	模型 II: 夫妻关系因子	模型 III: 分手倾向因子	模型 IV: 性生活质量因子
性别 a	.022(.013)	.158(.080)	.254(.129)	.508(.261) **
年龄	.010(.091)	-.011(-.093)	-.004(-.035)	-.029(-.248) **
户口 b	.187(.105)	-.083(-.042)	-.021(-.011)	.349(.178) *
家庭月收入			-6.702E-6(-.207) **	
教育程度 c				
初中	-.283(-.131)	-.160(-.066)	.741(.308)	-.264(-.111)
高中	-.260(-.138)	-.152(-.072)	.448(.215)	.340(.165)
大专	-.265(-.141)	-.243(-.116)	.785(.374)	.377(.183)
本科以上	.164(.039)	-.657(-.141)	.620(.136)	.546(.120)
社会资本				
特殊信任因子	.497(.424) ***	.033(.025)	.118(.084)	-.074(-.058)
普遍信任因子	-.227(-.236) **	.134(.125)	-.225(-.198) **	-.077(-.073)
同事信任因子	.508(.470) ***	.077(.064)	-.035(-.028)	.120(.101)
正式社团因子	.059(.071)	.066(.072)	-.133(-.148)	-.031(-.034)
非正式社团因子	.144(.143) *	.289(.258) **	.003(.003)	.200(.182) *
常量	-.249	.481	-.510	.214
N	126	126	121	126
调整后的 R <sup>2</sup>	45.9%	2.1%	5.3%	29.4%
F	9.827 ***	1.220	1.513	5.338

a. 参考类别为“女性”; b. 参考类别为“非本市常住户口”; c. 参考类别为“小学”

\* p < 0.1 \*\* p < 0.01 \*\*\* p < 0.001

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4个模型中,模型I和模型IV的拟合度较好,模型I的调整后的R平方高达45.9%,模型IV的调整后的R平方也达29.4%。但是,模型II和模型III的拟合度却偏低,说明模型中已有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力十分有限。

我们先来看看几个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首先,性别对于模型I、II和III的3个因变量,即婚姻满意度因子、夫妻关系因子和分手倾向因子均无统计显著性。不过,性别对于模型IV的因变量,即性生活质量因子的影响却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男女在性生活的快感获得方面确实存在显著不同。在所有被访者中,每次或经常体验到性快感的男性占24.9%,而女性只占12.0%。

其次,年龄对于性生活质量的影响有统计显著性。同样地,年龄对婚姻满意度因子、夫妻关系因子和分手倾向因子的影响均无统计显著性,只对性生活质量因子的影响。由于身体状况的差异,年轻夫妻的性生活质量显著高于年长者。

第三,户口类型只对性生活质量的影响有统计显著性。在我们访问的382个已婚者中,厦门常住户口为242人,其余136人为非常住户口。常住户口的受访者的性生活质量略高于非常住户口,并有一定的统计显著性。

第四,教育程度对婚姻质量4个因子的影响均无统计显著性。回归分析表明,受教育程度对于婚姻满意度因子、夫妻关系因子、分手倾向因子以及性生活质量因子的影响均无统计显著性。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在控制了上述变量之后,作为本研究的主要预测变量的社会资本各因子对婚姻质量各项指标的影响情况。

从4个模型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社会资本各因素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最为显著,但对于婚姻质量的其他3个指标,即夫妻关系、分手倾向和性生活质量的影响却很少或不具有统计显著性。4个模型调整后 $R^2$ 的差异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模型I的调整后的 $R^2$ 高达45.9%,这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资本贡献的。具体看,特殊信任因子对婚姻满意度因子和分手倾向因子都会产生影响。其中,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最为显著,即特殊信任因子得分越高,对婚姻的满意度也越高,这是因为特殊信任因子代表的是研究对象对亲朋好友的信任,而婚姻满意度中恰恰包括对配偶的尊重信任,因此,二者呈现出非常明显的正向关系。同时,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对于周围人的信任越强,自身的安全感也就越强,而这种安全感在夫妻生活中可避免不必要的猜疑和争吵,即降低发生冲突的频率,从而对分手倾向因子产生影响。

普遍信任因子对婚姻满意度和分手倾向因子产生影响。在婚姻满意度方面,普遍信任因子的作用十分显著,但与特殊信任因子的影响方向是相反的,也就是说对社会上一般人的信任程度越低,其婚姻满意度就越高,这与国内学者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有学者调查显示,信赖与婚姻满意度呈现极其明显的负相关<sup>①</sup>,但并未对此作出解释。其背后作用的机制,尚待进一步的研究加以探讨。同样,普遍信任因子对于分手倾向同样具有统计显著性,而且方向也是负的。这表明,普遍信任度较高的受访者其分手倾向也较弱。

同事信任能够显著增进婚姻满意度。从模型I中可以看出,同事信任因子不仅对于婚姻满意度因子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而且其标准回归系数高达0.47,远远高于其他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是所有自变量中对因变量影响最大的。

正式社团参与因子对于婚姻质量的4个指标的影响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但是,非正式社团参与因子对于婚姻满意度因子、夫妻关系因子以及性生活质量因子的影响都具有一定的统计显著性,而且这种影响也是正面积极的。

#### 四、结论

自社会资本这个概念被介绍到国内以来,许多学者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广泛研究。但是迄今为止,中外文献中还没有人系统地研究社会资本对婚姻质量的影响。本文在学术界率先运用社会资本的概念研究婚姻质量。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控制其他变量以后,社会资本对婚姻质量确实有一定的影响。具体说,本项研究的结论是:

第一,社会资本对于婚姻质量有显著影响,特别是对婚姻满意度有着显著的影响。我们认为,高质量的婚姻不仅在客观上表现出夫妻之间融洽的关系,而且还在主观上表现出对配偶及双方关系满意,即婚姻质量是夫妻的情感生活、物质生活、余暇生活、性生活、夫妻双方的凝聚力在某一时期的综合状况。因此在本项研究中,我们从主观满意度和客观指标两个方面来测量婚姻质量。数据分析表明,社会资本各因素对于婚姻质量客观指标(包括夫妻关系因子、分手倾向因子、性生活质量因子)的影响有限,但社会资本各因素对于婚姻质量的主观指标,即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却非常显著。

第二,社会资本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并不都是正面的,也有的起着负面的影响,例如普遍信任对于婚姻满意度就起着负面的影响。为什么普遍信任会降低受访者的婚姻满意度,我们的定量数据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这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深度访谈去弄清其背后的作用机制。

第三,社会资本各因素中信任因素对于婚姻满意度的影响更显著。本项研究主要从信任和社团参与网络两个方面测量社会资本,相对而言,信任各因素对婚姻满意的影响更为显著,社团参与的两个因子的影响相对要小一些。而在社团参与的两个因子中,又以非正式社团参与因子的影响更为显著。

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它可以有效地克服搭便车的行为,从而增进集体行动的效率。虽然本项研究的指标设计有待进一步完善,但我们的初步研究结果为社会资本的作用又提供了一个新例证。这表明,社会资本不仅可以克服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有效增进集体的福利,还可以促进个人的发展。

(责任编辑:陆影 luyinga1203@163.com)

<sup>①</sup>吴彪《自我和谐、人际信任与婚姻质量的相关研究》2008年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